元朝时期山西地区的特征及其影响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在入主中原汉地期间, 元统治者逐步将山西地区变成开展军事、政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地区。其间, 山西地区在元朝征服与统治的历史条件下, 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 在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各个领域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且对腹里地区, 乃至全国上下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产生过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元朝; 山西地区; 特征;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一、元统治者右路西向的战略重地

山西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之东, 中原大地以北之区, 古称河东, 又曰山右。这个地区东以太行山作为屏障与河北相隔; 西凭黄河作为襟带与陕西为堑; 南依黄河与王屋、太行等诸山之险作为河南门户; 北有勾注雁门和阴山山脉作为外蔽与内蒙古临界。前人历来将其称为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的“表里河山, 形胜之区”, 又称“河东者九州之冠”, “河东为天下雄胜之地”, “中原之有河东, 如人之有肩背”, 甚至竟有“不得河东不雄”的惊人之语。因此, 山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地军政势力的必争之地, 并且成为历代王朝抗击防御北方民族的前沿地带与屏障中原、关陕的重要门户。每当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际, 往往都是先从西路首先占领河东山西, 然后继续挥军南下。

征金之初, 成吉思汗曾经采取左、中、右三路对金朝领地展开全面进攻。当时, 术赤、察合台与窝阔台大规模地率领右路军攻略过山西地区。灭金之际, 蒙古军则是在占领河东山西以后, 渡过黄河, 实行南北夹击, 消灭金军主力, 彻底灭亡金朝的。灭金以后, 山西地区从军事上逐步变成元统治者在右路西向的战略跳板, 继续向着陕西、四川不断征服, 且在占领这些地区以后进行镇戍。平宋之中, 元统治者对于陕西、四川的军事征服是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步骤, 前后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其间, 这种始自蒙古大汗所制定的征戍格局与划分统领的固定模式具有持久、强大的影响力, 成为黄金家族习以为常, 奉行不悖的既定制度。

为此, 元统治者根据大蒙古国以来的历朝定制, 始终派遣山西地区的汉军诸部作为右路军参加川陕的作战行动, 并形成在右路西向上征服、镇戍并行划一的总体格局。元统治者采取右路西向的征戍格局, 还明显地从河东山西汉军将领的封授军衔上体现出来。庚子(1240)夏五月, 九原府主帅郝和尚拔都朝觐窝阔台汗于行宫, 被窝阔台汗封授担任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 易金虎符。^[1]辛丑(1241), 刘黑马以汉军第一万户被蒙古汗廷改授担任都总管万户, “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 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2]丁未(1247)九月, 梁瑛受诏“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 治太原”。^[3]

对于河北、河南与陕西来说, 山西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高屋建瓴, 易守难攻之势,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且以地近“天下腹心”所在, 成为“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的镇戍之地。在蒙古军占领山西地区以后, 博尔忽后裔率领蒙古军万户府驻扎留守在河东山西的南部地区, 便是着重于从中原汉地的整体镇戍展开部署的。探马赤军还一度在山西地区分散镇戍, 且在中统年间曾被忽必烈集结起来重新组成侍卫亲军。^[4]河东山西等处汉军万户府便担负着河东、陕西与四川右路

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的主要职能，因而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征戍中占有某种特殊地位。

在北方民族加强统治中原汉地之时，山西地区则又成为重要的辅翼地区与统治地盘。忽必烈定都幽燕，君临天下以后，河东山西便以靠近大都，成为右路西向上赖以藩辅拱卫统治核心的腹里重地，战略地位逐步提高。为了防御阿里不哥进攻大都，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诏万户郑鼎、昔刺忙古率领平阳、京兆两路宣抚司所领军兵七千人，于延安等处守隘。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又诏命过郑鼎统领征西等军，回防戍守雁门关隘。^[5]

随着夺取川陕地区军事征服的不断完成，刘黑马及其后人一度主持过川陕地区的军事镇戍。此外，郑鼎家族率领平阳精锐部队长期镇戍湖广行省，居于湖广汉军诸部之首。侍卫亲军的忠翊卫则在晋北地区镇戍屯田，担负着大都近畿右路西向的军事防务。山西地区的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与侍卫亲军诸部的各种军事镇戍活动不仅对于山西、陕西、四川及湖北等地的军事形势产生深刻的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全国上下的军事镇戍发挥出特殊作用。

有元一代，每当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战争风云形成之际，山西地区往往成为各种军事、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且以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一向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李璫之乱与天历之战中均可见到元统治者的敌对势力觊觎河东山西的明显迹象。中统年间，李璫发动叛乱之际，“自益都传檄，求臣叛王”，派遣使者前往山西地区。当时，平阳路总管李毅因为“移文太原”，遂被忻州达鲁花赤奏报处死。^[6]在天历之战中，上都方面亦曾纠集陕西之兵对河东山西采取过军事行动，共同展开攻击大都的两面夹击。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北方红巾军同样试图从山西地区打开夹攻大都的西向通道，从而展开激烈争夺。在元末上层统治阶层的复杂内讧中，河东山西或是作为元顺帝党羽的藏匿之所，或是作为地方军阀威胁大都安危存亡的腹心要害，甚至成为皇太子出走避难、率军复辟的肘腋之地。在“勤王”入卫山西地区以后，北方军阀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亦在这一地区展开反复的相互争夺。随后，察罕帖木儿以“用兵数年，惟藉冀、晋以给军而致盛强”^[7]，不仅逐步控制住河东山西的军事力量，而且借口用兵汴梁，屯兵泽、潞，遂使山西地区作为割据一方的主要地盘。其后，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不断经营，始将河东山西作为自保之地，而与其它敌对势力不断抗衡，进而形成独霸一方的统治局面，乃至最终成为元朝统治中原汉地的最后堡垒。即使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北上灭元的战略方针之中，亦不敢将山西地区作为进攻北方的主要目标，而是采取避实就虚，挖心破脊的高超策略。

总的来看，有元一代的山西地区在错综复杂的军事争夺之中具有异乎寻常的特殊作用，除了成为元统治者进行征戍与主要争夺的战略重地，还对藩辅拱卫京师大都，不断维护腹里地区的政治稳定与延缓元朝对于全国各地的持续统治都有相当重要的内在影响。

二、征戍屯田川陕等地的兵源之地

除了作为元统治者在右路西向上进行征服与展开镇戍的战略跳板以外，山西地区还是元统治者长期调兵遣将，征戍屯田川陕等地的兵源之地与屯驻奥鲁的战略后方。在征服与镇戍全国各地的过程之中，元统治者从河东山西签调过大批兵民出军征戍，这种征戍的签调情形，各种史书均有记载。

灭金之中，山西地区的汉军诸部很早便在刘黑马的统辖之下外出征服陕西、河南等地，在灭金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灭金以后，元统治者逐步促使河东山西的地方武装经过签调出军，进行扩编，不断纳入刘黑马所统辖的汉军诸部，进而在征戍陕西、四川的右路西向战略格局下，继续外遣征伐南宋。在平宋中，元统治者始终派遣山西地区的汉军诸部作为右路军参加入蜀的作战行动，所谓元廷“将有事于南服，桓桓兵甲，例作于晋”^[8]，且在这些地区被占领后进行军事镇戍。

除此而外，山西地区签调出军的汉军诸部不仅平定过蒙古诸王与山东李璫的叛乱造反，还在元末参加过镇压北方红巾军的作战行动。中统元年（1260），郑鼎率领河东道军曾平定过阿蓝答儿、浑

都海之乱。至元二十四年（1287），郑制宜扈驾东征乃颜，坚请赴敌上阵自效。其间，忽必烈命郑制宜从月儿吕那颜别为立一军，且以战功封授怀远大将军、枢密院判官。^[9]中统三年（1262），李璫叛乱之时，蒙古宗王合必赤统诸道兵围攻济南，晋州之兵“分戍其下”。当时，“城中危逼，突围以出”，晋州之兵“适当其冲，与之战甚力”。^[10]

在签调出军中，山西地区汉军诸部的各级军官大多甘心于接受蒙古军将的统领指挥，作为军中骨干力量，“招携伐贰”，征戍各地。其中，有的军将还以一门一族担任军职，或是留守后方，或是征戍在外，甚至效死亡命他乡。

郑泉“敬迓威命”，归附木华黎以后，一门之下在有元一代担任军政官员职务者为数甚多。其中，郑明，郑杲子弟，任为都统；郑辉，县丞；郑鼎，郑杲之子，担任镇国上将军，湖北宣慰使等职；郑甫，郑鼎之弟，“以扈从征西有功”，历任阳城、长子、潞城等五县县尹，后为中宪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高平郡公；郑制宜，郑鼎之子，留守都指挥，领少府监；郑云霄，郑甫之子，宣慰都元帅；郑均，郑制宜之子，大将军，枢密副使；郑廷瑞，泽、潞两州诸军奥鲁万户；郑涛，担任镇守武昌路平阳太原万户，后改行枢密院副使。^[11]

梁瑛，平遥人，从征二十余年，“披坚执锐”，“不敢告劳”，三个弟兄分别死于随从按陈与带孙那颜的征金之中。^[12]李佺，汾州人，曾以累功授征西千户，全族随从蒙古军都元帅塔海入川伐蜀，“屡建功勋”。^[13]郑鼎，阳城人，跟随塔海出征西蜀，“累岁从之”，“屡立战功”。^[14]

周允中，定襄人，承袭父爵，佩带金符，参加征蜀军事行动，担任太原路行军总管。^[15]杨宜从都元帅塔海西征川蜀，以其从弟杨琛担任先锋，“凡所攻拔，不避矢石，屡有成效凯还”。^[16]孔锦山，绛州人，初袭父爵为千夫长，从征讨伐累有战功，累升四川碉门等处镇守万户。其子秃鲁卜、次子也先不华俱为碉门等处副千户，佩虎符。^[17]

李昱，字仲明，榆次人。至元年间，李昱担任四川行中书省员外郎，身居幕府，“会金谷，调军食，转输供给，未尝乏绝”。甲戌（1274），四川行省授以李昱枢密副使、行枢密院事，“分道攻嘉定”，后以“成都乃四川根本”，授任成都路城防总管，通管军民大小事务。^[18]

梁成，襄陵人。“国兵选善骑射者，遂得帅卒征讨”。丁亥（1227），拔益都，攻河南，“会敌必克”。元太祖赐广威将军都元帅、金虎符。己丑（1229），其子梁祯从质子军征于朔方，世袭武略将军，充千户长，获赐虎符。乙未（1235），“没于边事”。^[19]

梁锦阳，字世荣，文水人。“少歧嶷，便弓马”。初从顺天道左副元帅贾同文参赞军务。右丞相伯颜荐为千夫长，从围南宋襄、樊、荆、宿、郢等州。元世祖时，担任江淮南北招谕使，佩金虎符，进左丞相、万户上将军，“镇守吴江，盗息民安，远近赖之”。元平南宋，擢拔统辖顺天、东宁、太原、京兆、延安五路都元帅，“屡著战功”。^[20]

李子敬，定襄东霍村人，博学能诗，精骑善射。至元年间，从军平蛮，官至军民镇抚，赠武略将军。^[21]靳颀，曲沃人，任征西大将军，不避艰难，殁于阵中，其后因以“获其尸而失其首，锡银首连葬”。杜安，盂县人，从忽必烈屡立战功，授任龙虎卫指挥使，擢升镇远大将军。后南蛮叛，杜安率军征讨，不战而平。^[22]高福，太谷县人。官任龙虎卫上将军，南部二路征讨元帅，立有战功。^[23]牛光祖，襄陵人，历官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佩三珠虎符，遍管军马。

杨再立，襄陵范村人，外戍担任成都监军。其子杨清，管军千户；曾孙杨著系上百户。李嶼，西梁人。至元年间，从军征讨潭、表二州。军抵城下，冒锋先登，论功为最。又征交趾，夺一字桥。后请主帅收服海南黎蛮，行至瓊州，战白娥岭，黎蛮悉平。回至南宁，遭遇埋伏，复斩二十三级，以功受封敕牒银符，修武校尉、瓊州万户府镇抚，升为副千户长。^[24]

牛荣，定襄横山人。从军讨伐，授以征行千户，上赐银符。牛清，牛荣长子，承袭千户；牛安邦，牛清长子，承袭千户。牛润，牛荣仲子，合州总管军事。牛海，牛荣季子，武略将军，征行千

户；牛安福，牛海长子，承袭千户；牛安顺，牛海季子，碯门、鱼顺等处征行千户。[25]

许庆安，辽州下武里人，授任湖广征行管军千户；许义，下武里主事、中武校尉，湖广征行管军千户，副千户；许仲良，下武里主事，敦武校尉，上万户府管军副千户。[26]

李元通，忻州人，以武功担任太原、平阳两路投下管领趁粮户都总管。李大中，担任太原路管军千户，赐银符。杨仲理，担任大都金牌万户。杨全，担任团练使千户。杨得运，以武功授金牌万户。郑伯祥，担任百户。刘顺，担任百户。刘璋，担任百户。张瑛，担任百户。庞用，担任百户。潘仁德，担任百户。赵荣，担任兴元府总管。马致柔，担任总管。刘邦祐，担任百户。[27]

元末之中，地方军阀进入山西地区以后，曾征调过河东山西的诸种军队作为南下镇压北方红巾军的武装力量。至正十九年（1359）五月，察罕帖木儿大发秦、晋之军会师汴梁城下，诸军环城筑垒围攻，韩林儿派“兵出战辄败”。经过三个月的对抗，刘福通“计无所出”，挟韩林儿逃回安丰。[28]在这次围攻占领北方红巾军都城的战役之中，察罕帖木儿给予北方红巾军以沉重打击，极大地削弱了北方红巾军的军事力量。

在打击北方红巾军的决定性战役中，山西地区在地方军阀全力镇压山东红巾军中再次发挥出重要作用，所谓“中原底定，山东荡平，皆调兵于晋”。[29]至正二十一年（1361）六月，察罕帖木儿总兵征讨山东红巾军期间，重新征调晋、并之军出井陘，辽、沁之军出邯郸，泽、潞之军出磁州，且与怀、卫之军及汴、洛之军一道，水陆并进，鼓行而东，彻底镇压了山东红巾军。[30]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元统治者所采取的陕西、四川右路西向的征戍格局中，还是元末南下镇压北方红巾军的前后过程中，山西地区均从军事上逐步变成元统治者的兵源之地。其间，河东山西汉军诸部的各级军官及其军队不是骁勇善战，充当先锋，便是忠于职守，镇戍一方，在元朝统一全国各地的征服与统治中不断发挥出重要作用，且对同时期的重大战局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典型区域

有元一代，全国形势从整体上多半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社会动乱的因素诸多。元初之时，大汗之位的反复争夺起落不休。从忽必烈立国称元到元朝中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元末社会的各种矛盾更是相互交织，不断激化。但是，山西地区自从灭金以后大体处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除了元末红巾军进入河东山西造成一定波动以外，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只有为数很少、规模较小的动乱因素。这些动乱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其一、山西地区周边发生的各种动乱。元初之时，河东山西周边地区曾有“率群盗往来阜平、曲阳间，杀人浑源界而夺之财”者。为此，山西大达鲁花赤速哥之子忽兰派“遣千人捕甄杀之，剿捕其余党，其害乃除”。[31]至正三年（1343）六月，五百余名罗里回回渡河寇掠解、吉、隰等州。至正四年（1344）八月，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壶关，至广平，杀兵马指挥”。郭火你赤原属山东益都盐徒，因为官府压榨所迫，聚众起事，“拥旗鼓，入城邑”，“火庐舍，劫府库”，横行山东、河南，“西抵太行”。不过，他们流入山西地区不久，“复还益都”。[32]

其二、山西地区少数人等的谋乱造反。至元三年（1266）二月，平阳路僧官以妖言惑众伏诛。至元十一年（1274）夏四月，诛杀西京讹言惑众者。至元十五年（1278），平阳李二谋乱，铁连捕问，尽得其状。[33]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月，大同之民李伯祥、苏永福八人，因以谋逆就擒伏诛。至正九年（1349）冬十月，冀宁平遥等县曹七七反，元廷诏命刑部郎中八十、兵马指挥沙不丁讨平。

其三、山西地区留驻诸王的所部叛乱。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诸王阿只吉部玉速福屡叛伏诛。天历二年（1329）九月，岚、管、临三州所居诸王八刺马、忽都火者等所部部曲，乘乱为寇，元廷派遣省、台、宗正府官员前往督促有司捕治。[34]元顺帝时，汪古部的灭里一度发动叛乱，欲杀赵王。

不论周边发生的各种动乱，还是境内少数人等或留驻诸王的所部叛乱，每次其中的参与人数通常不多，影响较小，一直未对山西地区的稳定统治构成威胁。河东山西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当与元统治者从军事、政治上有意识地加强这一地区的监督控制密切相关。统而观之，这一地区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主要取决于以下各种因素：

首先、元统治者一向重视山西地区的牢固统治，从军事、政治上将宗亲功臣分封到河东山西，先后实行监临、分封与准许蒙古诸王留驻等各种政策。有元一代，“监国公主”、独木干公主、术赤、察合台及其后裔等宗亲功臣均在山西地区获得过监临统控、分封食邑及率军留驻等各种大小军政特权。这些被分封到河东山西的蒙古宗亲都是黄金家族的直系成员，权势极大，并纷纷在蒙古汗廷的封授认可之下扩张势力，甚至一度将所授分地“一道细分”，不断加深对山西地区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牢固统治，且在河东山西形成强大的军政势力。忽必烈执政期间，有旨设立河东宣慰司时曾由分地设在太原的诸王阿只吉位下“委官一人同治之”，继续采取“宗王分土并门，廩饩，岁取民间”的供给措施，定期满足蒙古诸王及其部属的生活所需[35]，还以大量赏赐作为笼络羁縻的主要手段，不断满足蒙古诸王率军留驻山西地区的多种需求，极力确保这些诸王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元统治者长期实行这种制度颇有厚待蒙古诸王驾临控驭河东山西的深层内涵。对于功臣宿将，元统治者在山西地区进行分赏，赋予特权的人数较多，虽然目的主要基于论功行赏，维系人心，保障实现经济利益，但从客观上却是强化与加深元统治者在河东山西牢固统治的必要补充。

其次、山西地区地瘠民贫，赋重民困，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地区各级贤明有识官吏的施政活动关系密切。这些官员在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办学育才与体恤民情等各个方面的政绩明显，因而对于河东山西的政治稳定产生非同小可的积极影响。其中，县级政权所发挥的作用较为突出，不少县尹端行表率，听断明敏，劳心思治，如待己家，以致黎民百姓有所不忘，乃有去任将近十年仍使民众思念纪石之官[36]；有的蒙古、回回达鲁花赤同样得到山西地区的民众爱戴，以致被民立石颂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河东山西的这些官吏通过教民牧民，确实达到御民防民的政治目的。有些监察官员则在山西地区的按部纠举中，较有成效地严加监督，决疑断案，纠劾贪暴，行使权力，甚至对于诸王驸马的私属王傅采取较为严厉的执法措施。因此，河东山西内部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较少发生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现象，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再次、在忽必烈定都幽燕，君临天下以后，山西地区作为邻近大都，藩辅拱卫统治核心的腹里重地，受到元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元廷特别忌讳汉人“执把弓箭，聚众围猎”，反复诏令汉地各处“管民官司用心铃束，廉访司严行体察”。[37]大同路周围地区有很大范围内不许民间行猎。对于河东山西的戍守军队，元廷同样采取严加防范的各种措施，毫不松懈，以防不虞。至元二十四年（1287），西京、太原、太和岭等处把隘军人均不得携带弓箭，仅许“执把闷棍，巡防勾当”。大德元年（1297），中书省河东陕西道奉使宣抚呈报上言之中还专门提到：“太原路所辖州城有姓在闲达鲁花赤，多有执把弓箭之人，合行禁约”。[38]这些措施对于山西地区可能发生的武装反抗具有相当明显的限制作用。

最后、元末年间的黄河泛滥与开河改道对于山西地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元朝末年，山东与河南遭受黄河泛滥的为害至深。比较而言，河东山西虽有不少旱、涝灾害，但其整个地势居高临下，不受黄河泛滥的大灾侵袭。此外，由于开河工程没有调集山西地区的大批民夫，所以没有导致河东山西的大股农民参加武装暴动。这种状况成为元末年间山西地区形成政治相对稳定局面的又一因素。

总而言之，元统治者的各种措施与山西地区的某些条件，致使这一地区在全国形势动荡不安中避免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从而成为有元一代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典型区域。这种局面对于确保安靖一方，藩辅拱卫京师大都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且对维护腹里地区的政治稳定与延缓元统治者对全国各地的持续统治都有较深的内在影响。

四、满足元统治者多种需求的经济基地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统治者军事征伐与北方民族生产方式的持续影响下，经过金末战乱以后获得不断恢复发展，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畜牧饲养、狩猎捕鱼与手工诸业等各个方面均表现出某些明显的时代特征。

山西地区的粮食生产在继承前代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麦、黍、菽、荞麦与粟等作物构成北方旱地作物体系，同时在种类与分布上获得新的发展。在用途上，除了满足当地基本需要以外，还有相当部分用于供给大漠南北的军储民用，还对全国上下的军需赈济产生过较为重要作用。河东山西的水利建设在地方官府与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较好的发展局面，且为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提供某种程度的有效保障。为了满足元廷的用马需求，养马业得到较为广泛发展，并为宫廷内外的军用、饮食、运输与祭祀提供了大量的所需马匹。狩猎活动作为漠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存手段与生活方式以及中原汉地民众生活的补充形式，继续作为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

山西地区的晒盐、兵器、矿冶、烧窑、纺织、酿酒等手工诸业在继承前代的发展基础上不断进步，同时融入蒙古、西域等各个民族的手工业生产成分。当时，河东山西的手工诸业以满足元统治者的财政收入、军事征服与日常需要形成较为显著特征，且与官民使用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级官府的严密控制，形成官营专销手工业空前发展的特殊局面。其中，晒盐、兵器与矿冶的生产经营受到元统治者的异常重视，不断为财政收入与军事征伐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因而获得较为明显发展，烧窑、纺织、酿酒诸业亦有一定的进步。为了适应元统治者征服与统治的客观需要，驿站交通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出现新的扩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的恢复发展，商业活动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变化。作为山西各路治所，西京、太原与平阳三个路级城镇的恢复重建较为显著，且与重要城镇河中府构成河东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统治支点。其中，大同是山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元统治者在山西地区进行“以北制南”的统治中心与右路西向运输资源的中转枢纽。太原、平阳与河中则是各族工商业者聚集往来的主要城市与商品流通的集散中心。这些城市不仅是河东山西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活动中心，而且成为全国重要的工商城市。

大同、太原与平阳三路设有平准行用库窠关，置从七品官员从事有关管理事宜。河中府、汾州、潞州、解州路村等商业发达之地则设行用库窠关，以从八品官员加以管理。^[39]这些地方的特设官员开展官营金融交易，专门从事发行钞币、买卖金银、收换昏钞的各种活动，从而反映出山西地区商品交换的频繁进行与金融活动的分布状况。

元统治者在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中还依照征税的不同数量设官办课。根据有关史料表明，“太原路在城正七品，汾州从八品，真定路在城正七品，平阳路正七品，洪洞县从八品，河中府从八品，潞州从八品，大同路从七品”^[40]，在额办课程处所之中，太原路在城与平阳路均设提领正七品，大使正八品，办课为五千锭之上，与真定路在城的品级相当，属于北方地区最高品级的税务机构；大同路设提领从七品，大使从八品，办课为三千锭之上，与恩州、东平路、卫辉路、大名路、益都路等地的品级相当，办课均在三千锭之上，品级属于第二层次；潞州，河中府，汾州设提领正八品，大使正九品，办课均在五百锭之上，品级属于第三层次。这些地方税收官品的不同等级明显说明，河东山西各路城乡的商业活动一般均不低于河北与山东各个路份的发展水平，并在北方地区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至于山西各路商税征收的数量状况，《续文献通考》记载，天历年间，山西各路的商税额数：大同路八千五百三十八锭一十九两一钱；冀宁路一万七千一百一十四锭三十四两六钱；晋宁路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锭四十两二钱。^[41]这些商税经过河东山西各级课税官员的征收催办，纷纷汇入国库之中，构成全国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借以满足元统治者保持运作的实际需要。

总的来说，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及江南富庶，但在腹里地区中的情形较好，经济地位较为重要。在元统治者实行助军征讨、“以南资北”的方针政策下，这一地区的农牧业与手工诸业形成多种经济的发展特征，成为腹里地区满足元统治者多种需要的经济基地。当时，河东山西

的经济发展不仅初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需要，不断作为大漠南北经济困乏的必要补充，而且供给大都宫廷的日常之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支持元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开展军事征戍活动。其间，山西地区的物资、粮食不断运往南北各地，解州池盐成为元统治者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兵器生产不时提供全国各地战时所需的武器装备，琉璃、纺织、佳酿、药材与粮食进入大都宫廷，成为建筑、服饰、餐饮与医疗的必要成分，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同时，河东山西的驿站邮递交通设施不断扩展，不仅设立境内驿道，而且还有通往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往来驿道，这些驿道均以晋北地区的大同作为大都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在北方地区的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驿道之中，除了帖里干道不经山西地区通往漠北以外，其余两条驿道均需经过大同路方能抵达漠北。这些驿道对于促进河东山西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与漠北及西北诸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往来发挥出新的作用，且对后世的交通运输产生着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元)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典章九·仓库官》，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 [2] (元)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典章九·场务官》，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 [3]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M].卷十八，《征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4] (明)宋濂等.元史[M].卷九十九，《兵志二》；卷一百六十六，《石高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明)宋濂等.元史[M].卷四，《世祖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元)姚燧.牧庵集[M].卷十八，《故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上海：上海书店，1926.
- [7] (明)宋濂等.元史[M].卷四十五，《顺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六十三，《兵次孟津祭灵源王文》，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9] (明)宋濂等.元史[M].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 (元)危素.危太朴集[M].续集卷三，《灑吉刺君去思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11] (清)赖昌期.阳城县志[M].同治十三年刊本，卷九，《选举》.
- [12]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四，《梁秉钧碑》，线装本.
- [13] (清)李文起.汾阳县志[M].乾隆三十七年刊本，卷八，《仕实》.
- [14] (清)赖昌期.阳城县志[M].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十四，《艺文》.
- [15]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七，《周献臣碑》，线装本.
- [16] (民国)马继楨.翼城县志[M].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卷二十六，《人物》.
- [17] (民国)徐昭俭.新绛县志[M].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卷四，《名贤传》.
- [18]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M].卷八，《李公墓志铭》，上海：上海书店，1926.
- [19]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九，《梁君祖考墓碣铭》，线装本.
- [20] (清)范启埴.文水县志[M].光绪九年刊本，卷九，《人物》.
- [21] (清)王会隆.定襄县志[M].康熙五十一年刊本，卷六，《人物》.
- [22] (清)雅德.山西志辑要[M].乾隆四十五年刊本，卷二，《平阳府曲沃》；卷八，《平定州盂县》.

- [23] (民国)刘玉玠.太谷县志[M].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卷五,《乡贤》.
- [24] (民国)李世祐.襄陵县志[M].民国十二年刊本,卷十六,《仕籍》;《武职》.
- [25] (清)王会隆.定襄县志[M].康熙五十一年刊本,卷六,《人物》.
- [26] (清)徐三俊.辽州志[M].雍正十一年石印本,卷五,《仕官》.
- [27] (清)方戊昌.忻州志[M].光绪六年本,卷三十一,《武阶》.
- [28] (清)徐元文.明史[M].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9]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卷四十,《大元祠河清记》.
- [30] (明)宋濂等.元史[M].卷一百四十一,《察罕帖木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1] (明)宋濂等.元史[M].卷一百二十四,《速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2] (明)宋濂等.元史[M].卷四十一,《顺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3] (明)宋濂等.元史[M].卷一百三十四,《铁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4] (明)宋濂等.元史[M].卷三十三,《文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5] (元)苏天爵.元文类[M].卷六十八,《参知政事王公神道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36]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M].卷十五,《潞城县尹吴公去思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7] (元)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三,《赈饥贫》,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 [38] (元)大元通制条格[M].卷二十七,《兵仗应给不应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 [39] (明)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M].卷十,《忠定郝公神道碑铭》,线装本.
- [40] (明)宋濂等.元史[M].卷一百四十九,《刘伯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1]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一,《梁瑛碑》,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Characteristics and Affect of Shanxi Region in the Mongol-Yuan Period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 In the Mongol-Yuan Period, the Mongol rulers gradually made Shan-hsi Region change in to an important terrain in carrying out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Meanwhile, Shan-hsi Region showed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under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the Mongol-Yuan Dynasties' conquest and reign. Owing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 and strategic position, the region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etropolitan Province and even the whole state in the Mongol-Yuan Period.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hanxi Region; Characteristics; Affect

收稿日期: 2009-07-12;

作者简介: 瞿大风(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